

风雨进行曲

东北公安创业纵横录

杨之槐 / 著

群众出版社

第一章 向东北进军

1945年8月10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声中,在中国军民的反攻和苏联红军的参战下,日本侵略阵线全面崩溃,日暮途穷,无力再战,不得不发出乞降照会。当月15日,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经过全国人民和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浴血抗战,终于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了完全彻底的伟大胜利。从这一天起,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领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日伪法西斯统治下痛苦呻吟十四年的东北地区,也随之结束了它那受屈辱、受掠夺、受奴役的殖民地历史。

这是举国欢腾、万民振奋的历史喜庆时刻,同时也标志着又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中国人民同蒋介石反动派的斗争日趋激化,并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正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还是蒋介石反动派统治的旧中国的重要历史关头。

东北地区所处的政治地理位置和所拥有的重工业基础,决定它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果我们取得东北,就可以使之同关内解放区连接起来,摆脱长期受敌人分割包围的困难处境,进而建成一个具有丰富物产和发达工业的、并与苏联接壤的重要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立于不

败之地奠定基础；如果蒋介石反动派夺去东北，那就将切断我们与当时苏联的联系，并从南北两个方面钳击关内解放区，置我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地位，严重阻碍中国革命的发展。东北，显然已经成了一个密切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性地区，成了革命和反革命激烈争夺的战略焦点。

鉴于东北地区在战略上如此重要，党中央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设想，之后又着手做了收复东北、开创新区的组织准备和工作准备。日本侵略者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即8月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又发布了进军东北的战斗命令。大令一发，军旌竞指，干部团队齐发。到1946年春，一支有二十名中央委员、两万多名干部、十万多名战士的革命大军，即刻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从毗邻东北的冀热辽、山东、晋绥，从远距东北的陕甘宁、冀鲁豫、冀中、苏北等解放区，浩浩荡荡地陆续开赴东北。

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我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东北后立即占领了东北五十八个市县，并派干部在其中十二个战略要地任苏军军管副司令员。从而为我军的南北会师、为配合我关内大军向东北的挺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军事局面。

8月29日，胶东区党委吕其恩、邹大鹏率领战士渡海于辽宁庄河地区登陆，翌日占领该县县城，邹旋向沈阳进发。

9月6日，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曾克林部四千余人堂堂进入沈阳，并成立了以曾克林为司令员、以唐凯为政委的沈阳卫戍司令部。

9月18日，党中央派出的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同志抵达沈阳，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全面领导东北各条战线的斗争，开始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

这是一支经过长期锻炼和考验的革命队伍。他们凭着一颗红心、一副铁骨，同军舰、飞机运送的蒋军抢时间、争速度，先机踏进东北大地。为开辟东北新区，输进了一整批富有战斗力的核心骨干力量，从组织上奠定了革命在东北胜利的前提条件。

具有伟大战略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这次大进军，永远决定了整个东北的前途和命运。东北，既不再是日伪法西斯统治的东北，也将不是蒋介石反动派染指的东北了。党的阳光将普照蕴有无尽宝藏的东北大好河山；三千万东北人民将勇敢地站立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谱写祖国历史的新篇章。一个生气勃勃的新东北解放区，即将在同蒋介石反动派的斗争中跃然横空出世！

蒋介石反动派当然也深知东北战略地位的极端重要。然而，由于我军捷足进入东北，就把蹲在峨嵋山上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反动派抛在了时间后面，打乱了他们妄图独占抗日胜利果实的反共战略部署。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下，一面急忙乘美国的飞机、军舰向东北沿海港口运兵，窜入山海关，沿北宁路北犯，实行武装进攻；一面委派一批所谓特派员活动在东北，网罗和收编日伪残余势力，实行蒋伪合流。他们妄图前攻后扰，里应外合，从我们手里攫取整个东北，进而在全国范围内燃起内战的炮火。

1945年11月，蒋十三军、五十二军始抵秦皇岛。接着，蒋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二军相继运至东北。这些蒋军，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全是美械装备，与我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占据优

势地位，一时气焰十分嚣张，汹汹然不可一世。

当时，我军鉴于苏联政府受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要将所占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便根据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在苏军撤离东北之后，一面留下部分部队在南满阻击牵制敌人和坚持斗争；一面主动让出沈阳、长春、吉林等南满、东满主要城市，而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北满地区，从事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斗争目标是发动群众，建立基础，待敌分散，各个歼灭，最后转入全局大反攻。

针对敌强我弱这一形势特点，考虑全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当年9月间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伟大战略方针。刘少奇同志代中央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战略部署》中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了实现这一方针，从重庆谈判胜利归来的毛主席，在完全同意陈云同志《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之后，又于12月28日，代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极其重要的指示。

这个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同时着重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我们必须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上来，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应向

干部说明,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归于国民党,东北形势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

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争取东北的一系列指示,历史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它是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指明了革命前进的道路。

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汪金祥在当年9月间,正和辅佐方志敏发动过弋阳暴动的邵式平、叶长庚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一百八十多名党政干部从延安出发,渡过黄河,来到晋东南桐峪镇,准备在这里稍事休整,即驰赴华东天目山区去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在他们到达桐峪镇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保卫部部长杨奇清即飞骑赶到他们住处,向全体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命他们转赴东北的紧急电令。电令以简短直切的语言指示说:

“星夜兼程,一个不留,限二十天赶到山海关!”

杨奇清在宣读党中央的紧急电令之后,又向他们讲解了进军东北是一场夺取革命全局主动权的严重斗争,激励大家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昂扬的战斗意志,立即迅速赶赴东北。

这道命令一下子把他们的战斗意志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立即座谈讨论,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极端重要性及其必胜的前途做了应有的思想准备。

这支队伍,当时叫作南方干部第一大队,成员中多数是南方人,有些是在江西、福建等苏区参加过土地革命和二万五千

里长征的老红军战士；有些是在“七·七”事变后从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奔向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锄奸保卫干部中，有些是在中央社会部和西北公学工作过的同志。当中央命令他们转赴生疏而又寒冷的东北去的时候，他们都愉快地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决定，决心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完成党所交给的新任务。

于是，整个大队徒步出山西，下太行，入河北，转冀东，绕道山海关西面的九门口，由辽南前所车站上火车，直奔沈阳而去。

一路上，他们受到了关内解放区群众极其热情的接待和支援。每到一地，群众都主动探听敌军动静，帮助站岗、放哨、引路、护送，使他们从最安全的地方顺利地通过了同蒲路、平汉路和京津路上的三道军事封锁线，什么日伪残敌、地主武装，都没有挡住他们前进的脚步。

群众的热情支援，深深地激励他们平添了无限锐气。虽然行军路上，正遇上北方的雨季，他们只得在秋雨淋漓中迢迢而行，有时又靠夜间走路，甚至还有小股敌人尾追着，但是他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每天总要按照原定计划，赶上百里左右的路程，把尾追的敌人远远甩在了后面。他们就像一队从风雨中走来、又冲向风雨深处的开拓战士，奋征搏风斗雨中去营造那正待营造的一方热土。

但是到了东北，群众的情形却有所不同了。这支干部队伍住在山海关北面的前所和沈阳西北的马三家子时，具体了解到，群众对于压迫剥削他们的日伪法西斯势力，怀有刻骨的仇恨，他们不愿再当“亡国奴”，强烈要求翻身做主人。但是也有一些群众背后议论：“穿着二尺半灰袄，土里土气的，是他们打

败日本鬼子的吗？”“能敌得过国民党正规军吗？”“恐怕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吧！”在日常接触中，亲近中露出疏远，赞许中掺有猜测，期望中含着疑虑。他们的这种表现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他们长年累月地受日伪汉奸和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必然结果。相信经过艰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很快地同我们站在一起进行战斗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队领导更加要求严肃群众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强调从本质上认识和掌握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看来，同蒋介石反动派争夺群众，将是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根本关键性问题。群众工作做得好坏，将最后决定革命在东北的成败。

这支干部队伍在锦州车站暂息时，一些铁路职员围上前来。他们一面诉说当亡国奴的痛苦，一面探询说：“你们来了，还要不要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当汉奸看待呀？”同志们当即向他们解释党的政策，劝告他们赶快认清形势，站到人民这边来，然而他们还是有些将信将疑。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日伪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为了活下去而在日伪政治经济机构中担任某种职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以及其他有某些政治污点或一般劣迹的人为数一定不少。对他们是争取教育还是排斥打击？应当采取何种政策？这个问题必将提上斗争议事日程，成为我党在东北团结多数群众，孤立少数敌人的一个重要侧面。

这次行军，他们跨过四个省，行程近四千华里。他们经过华北地区时，日伪军队仍在扼守一些重要关路，等待国民党收编，不肯向我军缴械投降。蒋军则正在北犯，敌机不断从上空向北运兵，在一些地区已经燃起了内战的炮火。为了粉碎蒋军的进攻，我们许多军政领导同志都亲赴前线指挥战斗去了。仗

打得很漂亮。他们刚到冀东，就传来了胜利的捷报，我军在邯郸一带，打垮了蒋军的猖狂进攻，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给了蒋介石反动派挑动内战的阴谋以一次沉重的打击。到了山海关附近，我军正猛烈阻击着已在秦皇岛登陆并企图北犯的蒋军。在东北，一些日伪残渣余孽和“曲线救国”派们，则打着国民党旗号，招兵买马，大建其军，大肆发展反动党团特务组织，妄图配合蒋军抢占东北。事实说明蒋介石反动派已经兴师动旅地下山“抢桃”来了。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东北上空翻滚着战云，东北的山山水水不可避免地要在即将燃起的内战中，经受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而汪金祥一行则即将在锄奸保卫战线上，参加这场解放东北的尖锐复杂的战斗，为最后解放全东北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章 初进沈阳

——奋战敌丛谱前程

一 与东北地下力量会合

汪金祥一行驻进沈阳西北郊马三家子村时，沈阳已经下过头场雪。纵目极望，皑皑银辉满视野，呈现出一派关外冬日肃杀的景象。11月7日，他们坐上东北独特的轻便胶轮大马车，只听车声隆隆，蹄声得得，全队驰过寒气重重的广阔雪野，直入已由苏军军管了的沈阳市区。这些北上干部初度领略北国风光，又为终于到达目的地而精神格外抖擞，都盼着早一天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沈阳，日伪时起用清代旧称，叫做奉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侵略者就向辽东半岛和沈阳以南地区伸进了魔爪。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又取代沙皇割去我国旅顺、大连，设为关东洲，后又划归日本本土版图。在沈阳，则割租借地，兴工厂，办学校，勾结军阀、官僚培植亲日派，极力扩张自己的侵略势力。特别是建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鞍山、抚顺、本溪等钢铁基地，掌握和控制了沈阳以南、以东的交通命脉和经济命脉，使沈阳及其周围成了它侵略东北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九·一八”日本侵略的炮声就是首先在沈阳响起来的。伪满傀儡政权建立，它更把多年扶植的大批汉奸扶上台，进一步建立了各种法西斯统治机构。显然，这些日伪势力，

是蒋介石反动派借以利用驱使和我们争夺东北的一支天然的反革命力量。

中共东北局成立之后，已经召开过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加紧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捣毁日伪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

他们到沈阳的第二天，邵式平、叶长庚和汪金祥等几个领队人，就到住在和平区三经路的中共东北局机关去报到，要求分配工作。东北局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林枫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彭真向他们讲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交代了任务和政策，然后又亲自到他们住处，向全体干部做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动员报告。彭真的报告，进一步武装了他们的思想，激励他们以高涨的革命战斗精神，投入到开辟新东北的火热斗争中去。数天后，林枫就把他们这批干部中的一部分，分配到锄奸保卫战线上来了。

汪金祥当时被分配在东北局社会部任第一部长，并参加沈阳市委，兼任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任务是暂带一批干部到沈阳市公安局去坐阵领导，要求尽快把沈阳市内极度混乱的治安局面整顿出个样子来。同时要与地下工作领导人、已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的邹大鹏接头，酝酿创建与充实东北局社会部机构，以便在东北境内积极开展对敌斗争，适应整个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汪金祥出身于江西省弋阳县一个贫农家庭，早在192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中坚骨干，参加了方志敏发动的当地农民暴动，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弋阳暴动。暴动成功后，他任弋阳县政府主席团委员，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历任赣东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闽浙赣省

组织部部长、福建省政府副主席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侦察部部长、苏区中央分局成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1933年，率闽浙赣代表团出席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委员。1937年到达延安。1939年调入中央社会部历任办公处主任、二室主任等职。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在现实斗争中，他善于从复杂纷纭的诸多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瞄准打击方向，部署斗争全局。在执行政策中，他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分清敌我、防止和纠正错误倾向。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指示停止抢救运动后，他立即遵照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肃反审干九条方针，对一批关押在枣园被错误审查的同志，逐一认真地进行了甄别平反。在他主持下所做的第一个甄别平反的书面报告，中央审阅后认为“很好”，并做为典型经验予以转发，推动了整个甄别平反工作的胜利开展。汪金祥的革命经历，证明他是我党在锄奸保卫战线上的一位有丰富经验和卓越功绩的优秀领导者。

随汪金祥一起分配到东北局社会部的，有王鉴¹、黄宣文、汪吉、王初、海伦等同志。东北局社会部到达哈尔滨后，这些同志大都是东北局社会部的处室领导，负责侦查、审讯、治安业务和机关人事等日常工作。

1 王鉴，1917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1938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9月进延安军政学院学习，1941年编入枣园保卫干部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二室研究科工作。1945年11月，随汪金祥进入东北，历任沈阳公安局调查科科长、东北局社会部治安科科长、处长。1952年任东北公安局副局长。1954年调至中央公安部任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原子能保卫局局长。1960年调上海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副市长，并被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人大副主任。现已离休，1983年被公安部聘为部咨询委员。

那时，邹大鹏已从胶东解放区先汪金祥两个多月来到东北，为共筹锄奸大计，他们会了面。

邹大鹏是辽宁省辽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熟悉东北的地理民情，曾任过满洲省委委员和满洲共青团书记。“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领导过东北有名的反日筑路运动，活跃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一带地区，给日伪以严重打击。义勇军受挫后，他转移到晋绥解放区，任中共晋绥分局调查局副局长，然后被分配到山东任中共胶东区党委情报部长，是东北沦陷区地下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汪金祥和他会面时，他同东北地下组织和从解放区单线派遣的地下工作人员已经接上关系，了解和掌握了日伪残余和国民党的基本动向；同时又同接踵回到东北的“东北救亡总会”中的知名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闫宝航、徐寿轩、车向忱等建立了工作联系，通过他们争取和团结东北中上层人物和知识分子阶层，并协助推动了情报工作的开展。他地下斗争经验丰富，在情报工作上有卓越贡献，是我党在隐蔽斗争战线上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汪金祥与邹大鹏的协手共事，翻开了东北公安史的第一页。他们即将率领公安、情报队伍，在这部史册上，写下壮丽的文字，绘出灿烂的画图。

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和民主抗日力量，本来是有雄厚的组织基础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及其外围进步力量遍及许多城市和农村。东北抗日联军则在南满、东满、北满等山林农村地区，顽强地战斗着，严重打击了日伪法西斯统治。但是，由于日伪政权的残酷镇压和叛

徒的无耻出卖,到1937年前后,我方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地下党组织几乎全被破坏,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了整个东北。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火种不久又燃烧起来。一个受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地下组织正式建立。这支地下队伍,当时叫做“晋察冀边区东北救亡总会”,分布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四平等大中城市,并分别打进了伪满政府、军队、警察、银行、教育和协和会等机构内部,甚至在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周围,都布下了我们的力量。他们巧妙地隐蔽着,积极地活动着,向我们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日本侵略者垮台之后,这支队伍又乘有利时机,在组织上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一些拥护我们党的合乎做秘密工作条件的进步知识青年被吸收进来,进一步形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地下尖兵队伍。像隐蔽在中长铁路沈阳站任站长的姚艮,打入蒋空军司令部任工程师的白浩,埋伏在蒋匪绥靖第二大队任参谋室上尉组长的白山,以及打入蒋军要害部位的马范、吕天、兰中玉等同志,都是这时参加到情报战线上来的。他们或者猎取蒋军战略性、动向性军事情报;或者动摇、瓦解以至策反蒋军起义;或者协助人民公安机关破获潜伏特务组织,都在隐蔽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这些地下工作人员中,还应当提到张绍纪。他是伪满大汉奸张景惠的儿子,由于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对张景惠的汉奸卖国行为素有不满意,在思想上产生了革命的要求。后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他的堂兄、中共党员张绍维的教育影响下,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很快地锻炼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此,张景惠的官邸,实际上就成了我们地下工作人员联系接头和传送情报的最安全的据点。这个据点在工作中发挥了很好

的作用。

苏军进入长春以后，卖国成性的张景惠和他属下的伪满大臣们，又从他们顽固的汉奸本能出发，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他们暗中计议：“苏联要统治东北，还得像日本人那样，利用咱们这些人”，“多谢老天爷保佑，咱们的机会不是又到了么。”于是，他们决定由张景惠出面，按照蒋介石向日伪残余广播讲话的旨意，组织“治安维持会”，并试同苏军司令部联系，妄图取得承认和保护，以便顺线搭桥，易冠换冕，再次继续他们的傀儡生涯。然而，由于已被苏军司令部聘用的张绍纪得知他们这一意图，他们的黄粱美梦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那时，张绍纪为了配合苏军逮捕汉奸战犯，按照长春地下组织领导人王耀纪的指示，利用张景惠这群汉奸们对苏军的错觉和幻想，以自己容易取信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出面邀请终日深匿待机的汉奸们，到苏军司令部去“商议大事”。这群汉奸们果然相信不疑，第二天就随他一起到苏军司令部去听候“佳音”了。

苏军司令官似庄似谑地问道：“诸位不是想见你们的皇帝溥仪吗？”

“是的，想见，我们想要见见他。”汉奸们齐声回答。

“那好，就请你们一同上车去见你们的皇帝吧。”

汉奸们于是懵懵懂懂地上了汽车，被苏军送上飞机，当天就押送到苏联去了。

这些地下工作人员多是出身于上层社会，但有爱国进步思想的青年留日学生。在日都东京，他们秘密阅读了不少革命书籍，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和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并在全中国高涨的抗日浪潮中，自发地成立了“救亡会”、“救国会”等秘密的

进步组织，决心彻底背叛原阶级，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1935年，正值中共党员张为先、张鼎一也在东京留学，为秘密开拓抗日局面，他俩利用同乡同学关系，与这些进步留学生发生接触，经过长期的考察了解，肯定了这些进步留学生的革命倾向，遂逐批吸收他们参加了革命组织，这就是后来定名的由晋察冀边区社会部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嗣后，其中一些骨干并被发展为中共党员。1942年和1943年，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又派干部李振远和张有恒秘密去东北进一步考察，并参与领导这批地下力量。他们都做了肯定的评价，张有恒还向党组织写了考察报告，具体反映了这批地下力量的掩护条件和工作业绩。报告转到党中央，据说毛主席阅后很高兴，曾亲笔批道：“看来，东北并非铁板一块，东北工作是大有希望的。”东北地下生力军受到鼓舞，于是进一步形成和壮大起来。

这些地下人员都有很好的社会地位和掩护条件，长期周旋于敌人的刀林剑丛之间，保存和发展了自己的革命力量，在情报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已成了我们公安战线和情报战线上的重要骨干了。

汪金祥为在东北有这样一支精干的隐蔽队伍，而感到十分欣喜和兴奋。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这些地下战士们，一定會在敌区有声有色地演出一幕幕搏敌斗顽的好剧来。

东北局社会部，就是以关内来的锄奸保卫干部和从其他部门新调入的老干部为主要基础，适当选拔一批秘密工作的优秀骨干而健全和充实起来的。关内干部与东北干部的结合，公开干部与秘密干部的结合，对于完成锄奸保卫任务来说，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在东北各大城市张开了一面公开和秘密、内线和外线、进攻和防御紧密结合的锄奸保卫网，为后

来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一系列对敌斗争，做了良好的组织准备。

二 打碎日伪警察机器

汪金祥一行进入沈阳之前，我冀热辽十六军分区的部队，在苏军军管的条件下，初步控制了沈阳的局面。但一些地下国民党分子和日伪残余们也纷纷露头，扬言受有蒋介石的委令，在市内公然成立“治安维持会”，挂上省党部、市党部、区党部的牌子，闹起所谓国民党接收的把戏来。

沈阳市伪满警察机关，自然是他们急欲首先抓到手的重点部门之一了。

日伪统治垮台以后，国民党地下人员罗大愚和张宝慈，走出日伪监狱，就到沈阳在建立国民党反动组织的同时，脱去抗日外衣，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他们把全市的伪满警正、警佐们召集到一个叫做石警正的家里，开了秘密会议，会上把与会的警正、警佐们统统封为国民党员，并决定改奉天市警察厅为沈阳市公安总局，由石警正出任公安总局局长。一大批伪满警察就这样被罗致在蒋介石反动派的羽翼之下，继续把持全市的警察大权。

这实际上还是那个伪满警察厅，不过是换个幌子、重新乔妆打扮一番罢了。广大群众清楚地知道，日伪政权统治东北人民的一个最直接、最厉害的手段，就是在各地遍设法西斯警察机构。这套警察机构，像一张又大又密的蛛网，紧紧束缚和吞噬着东北人民。在沈阳这个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东北最大城市里，就设有：一个省警务厅，一个市警察厅，二十个区警察